走向文明的中国

——精神文明建设论

黄志秋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文明的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引论/黄志秋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9

ISBN 7—80109—197—3

Ⅰ.**走…**

Ⅱ.**黄…**

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国**

Ⅳ.D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8044 **号**

走向文明的中国 **黄志秋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 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朝阳东方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313 **千字**

印 张:13

版 次: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定 价:20.80 **元**

引言 :走向文明的中国

1996 年 9 月,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使中国人做出了关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理性的选择。其中有一句话发人深省: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新的面貌进入 21 世纪。站在世纪交替的转折路口,中国人这一行动连西方人都赞不绝口,羡慕有加,称之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提高个人思想道德素质,以促成正式舆论的正式文件"和"试图通过铸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相关的人际关系来反对道德上的弊端和市场经济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使中国人作好了进入 21 世纪前的最紧要最生动的精神准备。中国,正以其良好的精神风姿迈向未来;中国,正走向旖旎而瑰丽的文明境界。

一、现代社会文明病:物质与精神的背离

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特征的强烈反差映照下,我们不禁窥视到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弊端,那就是,物质与精神的背离。1992 年 9 月,日本草思出版社出版了国学院大学教授中野孝次写的《清贫的思想》一书,引起了轰动。该书揭示了日本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精神的贫困。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向美国式的产业社会转变,并模仿欧美向消费社会迈进,结果进入了充满矛盾的社会之中。在泡沫经济时期,奢侈浪费的风潮达到顶峰,人们的整个身心被巨大的金钱欲、物欲、占有欲所支配,成为欲望和金

钱的奴隶。泡沫经济破灭后，人们才从疯狂中清醒过来，痛定思痛，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少人注意到物质文明发展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为什么还是那么贫乏和空虚，开始怀疑经济效率至上主义的生产。其中有几个观点值得反思。一是通过对日本发展道路的批评，提出了物质与精神水乳交融的思想。作者认为，日本以输出大国自夸，只考虑本国利益，使外国市场受到冲击而萧条；与日本人谈话，无论是商人还是旅行者，全是有关金钱的内容，似乎只有金钱才能决定人的价值，如涉及政治、哲学、历史、国际关系、民族问题等话题，竟没有什么可说的；日本年轻人都只考虑自己，是利己主义者，不少年轻女子拿着大笔金钱到国外购买奢侈品，挥霍无度；日本人对贫国的人民表现得非常傲慢，甚至认为自己有金钱就无所不能。作者认为，这些指责虽听起来令人不快，却都是现实。日本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偏重于追求效率和生产第一的物质生产，而忽视了精神这一面。现在，日本确实物质丰富了，但是，无论物质生产变得多么丰富，不一定能够决定人们生活幸福。幸福的生活除了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物质以外的东西。确实，人们的生活需要和物质打交道，要进行购买、拥有、消费、废弃等活动，但仅此为止是不能使人的内心充实的。真正富裕，必须要对内心加以充实，对占有欲加以限制。作者指出，要选择清贫的生活，这里讲的清贫不是指贫乏，而是根据自身的思想和意志，保持积极的简单的生活状态。作者认为现今的日本人已被金钱欲、物欲、占有欲所支配，而日本传统文化则否定这些欲望的东西，蔑视物欲，认为欲望是实现精神自由的阻碍。人应该超越欲望，达到高度的精神和谐。

二是指出了追求物欲的副作用。作者通过分析日本战前战后和经济高度发展三个不同的年代，指出日本在实现生活现代化以前，能以苦为乐，把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看作比只知道积聚财富重要得多，决不采用偷盗、欺诈、收受贿赂、投机取巧等手段，生

活得很清静恬淡。而在战后向美国式的产业社会的方向转换时，却进入了充满奇形怪状的矛盾的社会中，人间陷入了无止境的欲望争斗中。仅以消费文化而言，现在，只强调消费而不强调保存，有的东西稍微使用一下就厌烦了，立刻作为旧的东西处理掉，并热望着最新的东西出现。取得——暂时的拥有——丢弃——新的取得，构成了消费的恶性循环。对物的浪费不但没有带来国家富裕的感觉，反而带来了荒废的感觉。在这任意的浪费之中，显示了日本现代人的精神境界的低下和贫乏。日本确实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社会之一，什么东西都能买到，生活变得便利、舒适了，但实际情况是人们并没有觉得幸福，物质繁荣埋没了真正的人性，使人们感到窒息，这种错误完全是由于不注意人而只注意物和经济效率至上主义的生产所导致的。

三是提出了应当怎样生活的思路和方式。作者提出人与自然宇宙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的生活，只有抛弃狭小的自我，抛弃金钱欲、物欲和占有欲，才能感到生活的意义，心灵在广阔的世界里才能变得自由而充实。作者指出，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作为人的生活的基本条件，第一是食物，第二是衣服，第三是住所，这也是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不挨饿，不受冻，不受风吹雨淋，就应该满足了。但是人人都容易得病，所以必须求医问药，这也算是第四种基本需求。人如果超过了这四个需求，就是追求奢华。所谓节俭，就是不超过一定基准进行消费，这个基准，就是上述的四个基本要求。

作者认为，不能把简朴的生活只作为口号，而要作为身体力行的行为，即提倡不浪费物品，主张简朴的生活方式。应该对物质最大限度地予以重视和爱惜，并把这种生活方式当作自己的当然义务，把清贫的思想当作人类应当具备的思想。最高的价值不是权力和富贵，而是人的品位，是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精神，人应该到达脱俗的高雅境界，与欲望脱离，达到心灵的自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清贫的思想》揭示的日本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其精神的颓废沉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参考意义。

确实，我们的世界正处于物质的繁荣与精神的裂变的矛盾缠绕中。从物质文明来讲，20 世纪是美好的。科学技术已使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汽车进入千家万户，飞机在空中穿梭，阿波罗登月飞船进入太空，电视、电脑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伴侣和帮手。20 世纪末世界经济的总量是上个世纪末世界经济总量的上百倍。医学、保健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寿命达到 75 岁左右等等，这些方面体现了人类的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但是，这种经济主义和经济带来的物质繁荣的表象背后，却衍生了“拜金主义”的孽种，无怪乎美国人把“企业就是美国的事业，金钱就是美国人的生命”作为座右铭。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日本，由于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及时对消费社会所带来的弊病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在制造泡沫经济的同时，也制造了泡沫欲望、泡沫消费。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清贫的思想被人们遗忘了、丢弃了，厌恶贪婪、热爱高尚的风气被贪得无厌、挥霍浪费、沽名钓誉和崇尚权势的社会风气所取代。“日本人”在外国人眼里，成了“经济动物”和“金钱动物”的代名词。据日本社会学家铃木健二 1989 年的调查，高达 80％的日本人认为：“现在社会风气欠佳，人们都只顾为自己打小算盘，对他人的事则漠不关心。”另外，有 70％以上的人则感到：“如今的世道只重钱、重物，就是不重人们的道德修养。”在日本，由于重钱、重物而不重道德修养的人的增多，所以导致人们对整个社会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根据日本总理府 1988 年 8 月的调查，居然有 49％的人“很少考虑为社会作贡献”，相形之下“愿为社会多作贡献”者却只占 43％，这说明积极关心社会的人只占少数。这种经济主义导致的社会走向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第一，经济犯罪增加。可以说，经济进步已成为经济秩序与经

济犯罪的竞赛。这些犯罪包括抢劫银行、贩卖毒品、拐卖人口、走私贩私、偷运军火、操纵股市、违法交易、恶意透支、制造假币、海上掠夺、入室抢劫、非法赌搏洗钱、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贿受贿、电脑金融犯罪等。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经济犯罪案件上千万起，涉及的犯罪金额高达上万亿美元，因为经济犯罪死于非命的达几十万人。

第二，西方现代化的负面意蕴。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正在西方扩展，过度的性自由正瓦解着家庭，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人们失去了精神信仰，正在于享受中消磨生命。在这里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点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普遍实行工具主义的理性化，整个社会仿佛成了技术社会，技术的专制使工业得以实现；把功利原则作为社会运行的杠杆，把功利的冲动作为经济发展的原生和唯一动力，把人塑造成商品原子，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作为价值观的基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打破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不断实现对自然的支配；在社会结构上强调法理化，摈弃特权和长官意志；在文化选择上崇尚多元化的开放性；在人的现代化上，注重人的开放心态、创造冲动、效率观念、权利观念，铸造现代化人格等等，以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经济现代化模式起了指导和牵引作用。但仔细研究一下，则不难窥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负面意蕴。工业化往往趋于非人化；功利原则必导致普遍的商品化与拜金主义；个人价值中心必然导致“他人即是地狱”的人际关系疏离、冷漠与紧张、冲突；人成为“单面人”的“物化人格”；人对自然的支配过当导致天人关系及自然本身关联的失衡，形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的法理化使人的世界日益抽象化、片面化；冷峻的法律关系、契约关系使人们面对一个森严的刚性世界；文化选择的多元化容易导致相对主义，形成普遍的意义危机及信仰危机，形成虚无感、荒诞感，导致反本质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这些负面

意蕴是其意识形态本质所决定的，决定了其现代化模式的畸形病态特征。

第三，导致世界危机四伏，动荡难安。由于经济利益的牵引，世界充满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阴影，完全的和平仍是遥远的梦想。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北方的发达国家与南方的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建立和维护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广大第三世界进行掠夺和剥削，到 1992 年底，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负债总额达 1.34 万亿美元，占世界人口 20％的最富裕的人的收入与占世界人口 20％的最穷的人的收入差距扩大到 90 倍。

一些强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经济模式强加于人，并把是否同意推行他们这一套作为给予援助、进行合作的条件。如不同意，就进行封锁和制裁；在国与国关系中，继续奉行“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强权政治来主宰世界，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侵犯别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本国“人权问题”避而不谈，却对别国的所谓“人权问题”抓住不放，肆意干涉别国的内政；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特别是在提供援助和高新科技转让时，附加种种政治条件，提出以“多党制”、“民主化”、“私有化”、“自由化”等为先决条件，在军售问题上，坚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逻辑，他们是世界最大的军火商，随心所欲地出售武器，却不允许别的国家按国际惯例进行正常的军品贸易；在多边外交中，他们企图通过联合国规划世界政治，干涉他国内政，动辄以联合国的名义“制裁”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施加压力，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他们还企图通过世界银行等等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等等。这种状况导致世界各种矛盾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

回首 20 世纪，这既是一个美好的世纪，又是一个问题成堆、混

乱不已的世纪。这便是人类在世纪转换中所面临的一个格局。对这种精神的危机和物欲、经济主义所引发的忧患，许多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反省与沉思。连美国人也开始提出塑造新的“美国文明”的口号，许多国家已把文明不仅仅看作是一种外在的标识，而把它作为一个国家内在需要和真正的力量所在。文明力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力是物质经济力与精神进步力的合力，体现了一个民族在经济发展与精神发展中的综合能力。文明力越强，这个国家、民族应对世界挑战的能力就越强，其发展就越迅速。

在这方面，新加坡向高度文明迈进，塑造新加坡文明形象的经验值得总结。新加坡作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小国，在 80 年代以前，也是重经济建设，对文化关注很少，在道德教育上没能遏制住随物质文明和西方思潮而来的道德水平的相对下降，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中有所发展。但 80 年代后，新加坡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一是始终重视和坚持文明建设，敢于动真格，坚持到底；二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当做一项完整的社会系统工程，把精神文明建设不单单看作个人的思想品德和精神状态，还看作社会群体和整体环境的文明，把精神文明建设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联系起来，建造“高雅社会”，并把它当作社会共建事业，使道德教育成为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完成的教育工程，把道德教育的内容看作是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完整系统等；三是把说教同个人利害联系起来，让受教育者明了政府所推崇和要人民接受的原则、观念和行为，不只对国家有利，也是和家庭及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四是使精神文明制度化、物化和行动化；五是在道德教育中，标本同施，在对社会新出现的道德问题如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嬉皮士”、黄潮、吸毒等进行有的放矢教育的同时，培植构成国民精神的基本道德原则；六是采取以教育为先导、以奖励作提倡、以强力惩罚作后盾，防患于未然，拒外来不良影响于门外等措施，

以保证精神文明顺利实施。新加坡这套成功经验取得了很大成绩，使新加坡建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建成了一整套运转良好的公共法规和制度，确立了讲卫生、重清洁、守时守法守秩序、有礼貌等良好习惯和社会风气；形成了廉洁高效、饮誉世界的良好政风及与工商社会相适应的职业道德观；社会形成工作态度好、守纪律、重质量、敬业乐业、依法行事的好风气；人民的教育水准提高很快，文化基础日渐丰厚。新加坡建设精神文明的经验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是对哪个国家都适用的，但其成功的方面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特别是迈向现代文明中出现的物质与精神的二律背反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与警示作用。（参见《东南亚研究》，1992 年第 3、4 期，董松赞：《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二、中国文明的复兴之路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威武雄壮、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喜剧。古代社会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长期的停滞不前，从文化角度考察，可以感觉到中国虽然有以“四大发明”为中心的文明光环，其内核——中国传统文化却不具备使中国文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自然演进的必然逻辑。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核心，辅之佛道思想，把“大同世界”充当虚幻理想，以“小康”生活作为奋斗目标，纲常伦理是最高准则，忠孝节义乃人生义务。对百姓，要求随遇而安，危难时却认为匹夫有责。对王权，鼓吹君权神授，形成不平等的事上役下的等级序列，个人缺乏独立人格、失去主动性、独立性。对待物质享受，认为贪欲是万恶之源，崇尚“淡如水”的清贫，不鼓励人们创造与追求财富，但对贪官污吏却缺乏有力的约束。这种中国农耕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求稳、求静、求和、重义轻利、道德至上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工业社会对人的要求大相

径庭，与工业社会的文化因子水火不相容。主要体现在：等级隶属关系与平等契约关系相冲突，差别待遇与统一原则相冲突；中庸信条与竞争原则相冲突；平均主义与贫富差别相冲突；“贵义贱利”的伦理观与物质利益原则相冲突；封闭与对外开放相冲突；保守与创新相冲突等。这种文化生态是导致中国文明长期停滞的渊源。

18、19 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势力渗于中国，打断了中国社会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国被绑上了追寻现代化的战车。其标志表现为，一是从封闭的社会开始走向开放。在开放的格局下，近代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国受到大规模外来文化的冲击，并被迫开放自己的文化系统，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与西方文化进行不情愿的交流；二是从单一农业经济社会走向工业化。资本的积聚与输入、投资经济环境的形成、产业工人的出现，使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三是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化，工业化伴随人口迁移和集中，工业点形成的工业区和交通运输枢纽以及外国资本集聚的通商口岸构成城市的雏形。到 20 世纪初，中国城市急骤增加到 191 个，近代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强拉进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组成部分。从积极的意义来讲，虽然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社会阵痛的代价，但也使中国传统的周期性恶性循环危机得到缓解。但由于内外原因，这种西方化道路的选择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惨重的牺牲品。

由于西方化目标的选择失败，中国开始了新的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现代中国焕发了青春，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奠定了政治与经济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气魄，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设想，描绘了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企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之路。应该说，这个时期实现社会文明的“航道已经开通”，但由于受教条主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的影响和照搬照抄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加上自身缺乏建设经验，以致出现一连串的失误，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社会资源配置和分配平均主义化，使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衰退；二元社会结构改造的背离导致城市化的迟缓；社会管理的集权和强制使政治管理民主化、法制化陷入扭曲；“文化滞后”与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导致现代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不开化状态和对知识科技的轻视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以反“崇洋媚外”、“洋奴哲学”为标志的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等，使现代中国在一段时期的文明之路处于无望的尴尬境地。建国后 30 年，中国文明在新社会制度基础获得稳定性之后，新的活力没有得到充分展现。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埃德曼·赖肖尔曾在本世纪 20 年代预言：在中国，有年轻改革家们的强有力运动，若能获得适当的时机，他们就能使自己的祖国返老还童，创造出较之西欧人称之为文明的磨损了的研磨机似的文明所无法估量的远为优秀的文明。这一时机是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战略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使中国文明之路迈入了崭新的快车道。随着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矢志探寻以及改革开放战略的全面推进和市场经济目标的确定，中国追求现代文明之路越走越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 1995 年已提前五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建立；对外开放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利用外资大幅度增加；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区域经济不同程度地发展壮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很快，科技教育事业取得重大进步，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塑造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在这里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这里所谓的“最佳结合点”,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塑造文明之路不谋而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手段——改革开放与实现现代文明的目标手段同出一辙;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与现代文明的目标殊途同归。塑造中国现代文明目标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理性化等体现发展成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通过经济繁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三大支柱展现其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功之时,也是中国文明之路实现之时。

十多年风雨兼程,中国文明已进入雏形初现的境况。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明发展之路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从片面的经济增长走向全面的社会发展。中国在追寻文明之路时,把文明看成是社会各要素全面、协调的进步,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中国社会的生活质量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社会结构和人的素质、社会制度和财富分配方式、思想道德观念和伦理关系等等,因而在塑造文明的实践中努力避免过去单一化、片面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确立了社会发展五个指标体系。在社会结构方面,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知识结构、城市化水平、就业水平、安全网覆盖面、外向型经济结构等指标;在人口素质方面,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等指标;在经济效益方面,包括人的物质生产水平、综合经济效益的产出指标;在生活质量方面,包括收入水平、吃住消费水平、生活方便程度、文化生活物价指数、环境保护等指标;在社会秩序方面,包括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交通事故和工伤、火灾事故等逆向指标。总之,在社会发展目标中处理好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物质目标与精神目标、直接目标与间接目标、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二是从禁欲主义走向人的需要满足。现代文明之路抛弃过去以极左面貌出现的贫穷的、禁欲式的

社会主义，勇敢地提出“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口号，在确定文明发展步骤时，始终不忘把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作为标准和参照系。我们每一项重大决策的出台，其中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就是人民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和满意度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在社会发展中，强调效率目标，即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产出，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提高人民生活为目的。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走向文明之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文化变革，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即人的全面发展。其内涵包括人的基本需求满足、人的素质提高和人的潜力发挥三个层次。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人自身具备现代人的品质和特征，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敢于向传统挑战；要建立开放的、立体的、动态的、快节奏的、创造性的现代思维方式；要形成注重实效、崇尚思变、敢于冒尖、雷厉风行、追求卓越的行为方式。使人的素质体现时代精神，把人塑造成与时代同步前进的“新人”。人的全面发展还要求充分挖掘人的潜力，促进人的积极性发挥，重视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培植人的自我理想和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勇于追求，大胆探索。

正因如此，我们在探索现代化目标过程中，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繁荣时，不忘重塑社会文明；在建设物质文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不忘塑造反映人类精神进步与开化状态的精神文明，并通过科技的输入和教育手段来实现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以达到“人—物”的协调与统一。上述论证，总结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中国文明勃兴之路抓住两条：首先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发展和振兴我们的经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身就涵盖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动力。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如果我国的综合国力低下，经济实力不强，就谈不上什么文明的复兴和民族的振

兴。其次，就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经济是基础，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反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现代化建设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我们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经济建设乃至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蚀，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就会日渐衰败，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甚至导致整个社会变质，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只有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我们才能以自己强大的综合国力自立于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在西方文明走向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一本书的书名所称的“西方的没落”之时，中国文明的精神力量越来越显示其内在的价值。

美国当代著名现代化专家英格尔斯曾指出：“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个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精神现代化是这个民族持续发展的基石。

精神文明、精神现代化可以有效地改变阻碍社会发展的旧的观念、心态和行为方式，使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

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塑造出本民族的一种创新精神，积极主动地承担个人对民族发展应负的职责，兢兢业业地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可以把一个民族的精神力凝聚在一起，并不断转化为发展经济的动力。

可以说，一个没有“精神现代化”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

化;一个没有精神文明建设的民族,则不可能使自己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中国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确立了两块强有力的基础。

18 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展翅翱翔的动力之一,它也预示着中国文明复兴的到来。

三、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在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应得到鲜明而深刻的体现和实现。这是因为,跨世纪的中国,不仅肩负着由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且面临着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道德信条相互激荡的新考验,现实的情况要求必须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且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能否从跨世纪社会发展目标的高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 21 世纪。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开始走过徘徊,走过彷徨,冲破误区,认识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已经向我们走来。我们通过一个侧面,就可窥见精神文明建设的朝气蓬勃的局面。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实践,在 80 年代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全民文明礼貌月”、“军民共建文明村、街道、乡镇、学校”活动、创建文明村镇、创建文明城市等的基础上,如今一个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热潮,在全国

上下陆续兴起。有“创建文明单位活动”,这是一项以基层单位为重点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有“创建安全小区活动”,这是把城市里小区内(包括社会单位、居民住宅)各单位和城市居民的积极性综合起来,把文明市民教育、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绿化美化、便民服务和群众文化等务项活动结合起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建设好城市的精神文明;有评选“文明家庭”和“农村文明户”活动,这是以城乡家庭为主要依托开展的一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评选“十星级文明农户”活动、评“三户”活动、争创“新风户”活动和评选“文明户”活动;有“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对促进各民族的友好团结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有“春蕾计划”(专门用于帮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女童重返校园)、“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活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这是推动精神产品生产繁荣的带有导向性的“龙头工程”,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力争每年推出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电视剧(片),一部优秀电影和一篇有创见有说服力的好文章);有城乡妇女的巾帼建功活动;有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工程(在我国边境沿线基本建成文化设施比较齐全、文化活动丰富活跃、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文化网络);有“跨世纪优秀人才规划”(旨在造就一批高水平学科带头人);有“观看百部爱国主义题材影视片活动”,旨在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有“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包括青年志愿者活动、“青年文明号”活动、“青年文化园”等形式;有“万村书库工程”,开展文化扶贫,为全国 2 万个贫困村庄设立图书室并赠送 100 种农村实用读物;有推广文明服务用语和服务忌语活动,推动了社会服务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实行“全民健身计划”,旨在增强中华民族身体素质,使国民体质和群众体育的主要指标,在下世纪中期达到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青少年“科技传播活动”,鼓励科技人员向青少年传播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并通过学习济南交警活动、学习张家港两个文明一起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